

## 何启、胡礼垣行迹述考

张 仲民

晚清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以其合著的《新政真诠》知名于世，该书呼吁效法西方，变法改革，推行宪政，尤为后来的研究者重视，但有关两人，特别是关于何启本人的第一手资料非常欠缺，既有研究多根据二手、三手资料或传闻，有不少错误及缺乏推敲之处。以下笔者根据既有的原始资料、时人记载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两人生平行迹进行一番钩沉考辨，或有利于加深对两人的认知。

### 一、何启

何启 (Sir Kai Ho Kai)，原名何神启，字沃生，原籍广东南海人，咸丰九年二月十七日 (1859年3月21日) 于香港出生。其父何进善，共有五子六女，何启排行第九，为第四子。<sup>1</sup>进善良于经商，亦是伦敦传道会牧师。<sup>2</sup> 故何启出生后即受洗于传教士及汉学家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牧师。<sup>3</sup>

五岁时，其姐何妙龄嫁于伍廷芳。十一岁入香港当局所办八年制中学中央书院 (Central School) 求学，此校为当时香港最有名之中学，是新式英语学校，1889年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 (Victoria College)，1894年改名为皇仁书院 (Queen's College)，孙中山在1884—1886年曾就读于此。因何启聪颖，直接越四级进入四年级 (Class 4)，两年后，十三岁，何启父死，何启中央书院提前毕业。<sup>4</sup> 应该是在这段时间，何启结识了时在中央书院任教的胡礼垣。之后，何启赴英国肯特 (Kent) 入读 Palmer House School。离开该校后，何启开始学医。

十六岁 (1875年9月)，何启在 Aberdeen University 注册，四年后毕业，期间何启成绩优异，被授予过奖学金，最后顺利获得医学学士、外科硕士学位。大概这期间，认识了长于自己七岁的英国女友雅丽氏 (Alice Walkden)。随后何启在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医院之一 St. Thomas's Hospital

---

<sup>1</sup> 有研究者说何启为第二子，亦有研究者说何启为第五子，实际上，何启墓志铭标其为第四子。

<sup>2</sup> 余启兴：《伍廷芳与香港之关系》，《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1年，第266页。

<sup>3</sup> 参看李志刚：《民国以前香港基督教之本色化事业及其影响》，收入氏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一)，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第247页。

<sup>4</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

实习,复经考试获得外科医生执业资格;同年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会员。<sup>5</sup>后来时论曾评价说,“华人之出洋习医考到上等者,如黄宽、何启、颜永京,皆是也。”<sup>6</sup>

1879年,可能受到雅丽氏的说服(两人1881年正式结婚,这可能是近代第一对正式的跨国华英婚姻,在当时种族主义盛行的维多利亚英国非常罕见),<sup>7</sup>何启暂舍医学改学法律,进入英国四大法学院之一的伦敦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学习,这种由医学到法学的陡然转变,在当时并不常见。不过,何启在法学院的表现不逊色于他在医学院的成绩,“以医道可济世,律学能治心,乃先考医学,列高等……再数年考律学,列第一。”<sup>8</sup>因为这种杰出表现,在1882年2月7日召开的立法会上,何启受到时任港督轩尼诗(Sir John Pope Hennessy)的称赞:“这个已经获得林肯法学院最高等荣誉的年轻绅士(指何启),将要返回香港殖民地。”<sup>9</sup>此人也是第一位支持华人参与香港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的香港总督,他于1877年4月—1882年3月在任,故他能对何启如此关注。

光绪七年辛巳(1882年1月),何启从法学院毕业,获得律师资格。此段留英经历,对其后何启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理想影响很大,日后何启受到港英当局重用,与其英国教育生涯特别是林肯法学院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随后,何启携雅丽氏返回香港,先进入私人医院工作,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西医。不久他发现他的中国同仁与病人并不相信西医,何启遂改行做大律师(a barrister)。在进行诉讼时,“他坚持公正、严谨与廉洁。经常说富人不会好心肠,反而往往居心险恶。每当他处理兄弟争产案件时,首先在打官司前就据理阻止他们对簿公堂。由于这些原因,虽然何启身为律师多年,但他依然光景不好。”<sup>10</sup>何启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还被港英当局委任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对于香港中文报纸《华字日报》的经营运作,何启也积极襄助。<sup>11</sup>

---

<sup>5</sup> 当然,如何启传记作者所言,获得这些学历与资格并不意味着何启在外科学上造诣多深,因为对于当时一个普通英国外科医生来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条件。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 21.

<sup>6</sup> 《论西药渐行于中土》,《申报》1888年1月29日。

<sup>7</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 22.

<sup>8</sup>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159页。

<sup>9</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 22.

<sup>10</sup> 转见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p. 43-44. 有关何启这段律师经历,可参看该书第35-48页。

<sup>11</sup> 据时任《华字日报》总理的陈止澜说,在《华字日报》创办之初的同治三年,伍廷芳、何启等即参与其中。陈这里应系将何启后来的参与活动提早了。参看陈止澜:《本报创造以来》,《〈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刊》,香港:《华字日报》编辑部,1934年,第1页。

1884年6月8日，妻子雅麗氏病逝，留有一女，送给英国外公家哺养。<sup>12</sup> 何启续娶华侨女子黎玉卿为妻。二十七岁，何启被港督任命为“公众卫生委员会”非官方委员（1886—1896），为改善香港华人社区的医疗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他尤其反对按照西医和西方的卫生标准来对待本地华人居民，提倡尊重中医和華人的生活习惯。之后，何启还先后获得多种官方和非官方的职务与称号，如 the Standing Law Committee, the Examination Board, the Medical Board, the Po Leung Kuk Committee, The District Watchmen Communitie, a knighthood, 等等；何启同时还是香港医学院的创建者之一。<sup>13</sup>

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年2月26日），为纪念雅麗氏，何启出资支持伦敦传道会开办雅麗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附办西医书院，何启出任医院名誉秘书，兼授高级课程。<sup>14</sup> 此医院培养人才甚众，孙中山即是其中之一，他于光緒十三年八九月间入西医书院，光緒十八年（1892）毕业；同学有陈少白、王宠益等人。<sup>15</sup> 这段学医经历对孙中山日后事业影响很大，除结识后来援助他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医生与不少同道外，孙中山日后思想也颇有受何启影响之处，如何启女婿傅秉常所言：“孙中山总理为该校（指西医书院）第一班学生，后余随侍总理左右，总理于暇时常谈起受何启教益之种种，自谓其革新思想颇受何启启发。”<sup>16</sup> 何启对日后孙中山的事业也多有赞助，<sup>17</sup> 开端即赖此师生关系。<sup>18</sup>

---

<sup>12</sup> 有研究者说此女早殇，但何启女婿傅秉常说他1919年在伦敦还见过。沈云龙等：《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3年，第10页。时人孔天增（Kung Thies-Cheng）在为何启所写的英文传记中，也说此女被送往英国。Kung Thies-Cheng, “Prominent Foreign-Educated Chinese,” *The Word's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寰球中国学生报》), Vol. 1, No. 2 (Sept., 1906), p. 22.

<sup>13</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 25.

<sup>14</sup> 罗香林：《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香港：珠海书院，1971年，第15页。

<sup>15</sup> 参看吴伦霓霞等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1986年，第18-30页。

<sup>16</sup> 沈云龙等：《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0页。关于何启与孙中山关系，可参看方豪：《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兼记〈新政真诠〉二次重印的经过》，《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2108-2109页。

<sup>17</sup> 据刘成禺记伍廷芳言：“沃生为律师，兼港绅，领华民政务司事。沃生之友胡礼垣，最善中文，同发表驳张之洞《劝学篇》书后，传诵一时。沃生又与陈少白等著《盛世危言》，中山先生曾参以己意。孙先生与陈少白来沪，将此稿售于粤人上海招商局总办郑观应，由观应出名刊行，售价二万金。《盛世危言》全部最后一篇，则孙先生与陈少白所补录也。孙先生携此两万金，草就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未果行。予在港，理律师事，皆未与闻。沃生则颇有兴味，然始终未作清朝之官，此沃生高尚过人处。沃生死矣，其手创之亚理士医院学堂，即藉此以纪念其英国夫人者，得学生如孙中山、尤烈、陈少白等，皆为建造中华民国之伟人，亦足慰沃生之志愿矣。”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3-164页。此处说何启、孙中山等人著《盛世危言》卖与郑观应，恐不确，或系刘之杜撰，否则诸

光绪十三年正月，曾纪泽在 1887 年 2 月 8 日香港英文报《德臣西报》(*China Mail*)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何启以“华士”(Sinensis)笔名在 2 月 16 日《德臣西报》上发表了回应文章《曾侯论书后》(“*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 Replay to Marquis Tseng*”)，批评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的观点。<sup>19</sup> 稍后该文由胡礼垣译增为中文《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发表，此后他和胡礼垣合作发表了多篇政论，系统阐述改革的新思想，抨击有关的保守言论与行动，呼唤“真自由”。如光绪二十年(1894)联合发表的《新政论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新政始基》、《康说书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新政安行》、《〈劝说篇〉书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新政变通》等，这些文章多由何启英文表达，胡礼垣再用中文加以发挥扩充，先后发表在《德臣西报》、《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国旬报》等报刊上。<sup>20</sup> 个别文章还为国内的报纸转载与介绍，如《新政论议》一文就被《申报》进行了介绍，并加以西学中源式的解读，鼓吹“新政之行，正古法之复也”。<sup>21</sup> 该文还曾被某读者阅读后特意登报致谢，实际是为之作广告宣传：昨承香港中华印务总局以何君沃生、胡君翼南所著《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一帙见贻，受而读之，觉议论崇宏、见识远到，贾谊《治安三策》，未必能专美于前。两君诚今之有心人哉！为跋数言，以志钦迟！<sup>22</sup> 另外，《〈劝说篇〉书后》一文还出版有单行本，定价一角五分，在上海由格致书室、广学会、《游戏报》馆发售。其广告曰：此书为大律师何启所著，于古今中外政治学术之源流了如指掌，其驳正南皮尚书原本处义正辞严，不少假借，尤足为尚书诤友。凡百君子，不可不读也。<sup>23</sup>

何启、胡礼垣把 1899 年前的六篇文章被收录一起，由朋友锡名为《新政真论》在香港出版，后该书补充了《新政变通》和《前总序》、《后总序》，在上海再版。<sup>24</sup> 书中的个别篇目，像《曾侯论书后》等被收入《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新政论议》则被梁启超列入《新学书目表》中，《〈劝说篇〉书后》则被收入《皇朝蓄艾文编》中，该文受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高度评价，他在 1899 年 11 月 27 日与张元济的笔谈中说：“《劝学篇》文字老成，然其议论于泰西事情则一知半解，有贻笑于识者。何君启《书后》，虽攻之过于刻薄，而其切当之处，则张尚书难

---

多孙中山研究者恐早如获至宝，将郑氏版权剥夺矣！

<sup>18</sup> 参看吴伦霓霞：《兴中会前期（1894-1900）孙中山革命运动与香港的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1990 年 6 月），第 220-221 页。

<sup>19</sup> 有关情况可参看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p. 195-201.

<sup>20</sup> 各篇文章写作或发表时间，参看《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74-75 页。

<sup>21</sup> 《中国宜行新政论》，《申报》1895 年 6 月 10 日。

<sup>22</sup> 《赠书鸣谢》，《申报》1895 年 5 月 31 日。

<sup>23</sup> 《劝学篇书后》，《中外日报》1899 年 10 月 17 日。

<sup>24</sup> 参看方豪：《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兼记〈新政真论〉二次重印的经过》，第 2107-2108 页。

措辨者，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盖非张尚书之流也。”<sup>25</sup> 内藤同时还关注了何启的《新政安行》等著作的出版情况。何启、胡礼垣的思想也被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在所著《支那学术史纲》中提及，并为在1907年底读到《支那学术史纲》的士人徐兆玮注意并摘录：其说我朝学术，谓发挥汉宋之学不遗余力，惟以忠君之说，献媚朝廷，是其所短。独南海何启、胡礼垣唱导自由民权，于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排击痛快。广东一隅最为进步云云，尤独具只眼。旁观者清，盖逆知专制之不足以自立，而民权必有发达之一日也。<sup>26</sup>

除了何启与胡礼垣合作的这些文章，何启还用英文对当时局势发表一些评论，有时还与韦玉(Wei Yuk)合作发表文章。<sup>27</sup> 亦曾在香港商会开会时发表演说，陈述中国周边形势，鼓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sup>28</sup>

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1914年因健康原因退休，何启一直是香港立法会的非官派议员，在前六年，何启甚至是唯一的华人成员，在职期间，他积极地参加有关活动并表达意见，获得时论与官方好评。<sup>29</sup> 光绪二十年，香港发生了一次破坏性非常严重的瘟疫，在应对瘟疫过程中，作为立法会和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成员，何启很好履行了自己职责，充当了港英当局与华人居民之间的桥梁，维护了华人社区的利益。<sup>30</sup>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兴中会图谋发动广州起义，对清廷统治不满的何启亦进行了襄助，“于对外宣传及起草英文宣言，大得其(何启)力。”<sup>31</sup> 光绪二十二年(1896)，何启在伍廷芳陪同和推荐下，因经济窘境赴上海求职，违心地充当了两个月的盛宣怀客卿。<sup>32</sup> 这时，他同伍廷芳的政治观点愈发分歧，何启认为清廷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已经不能成为改革的依靠，他开始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伍廷芳则仍然选择相信清廷。<sup>33</sup>

<sup>25</sup> 内藤湖南、青木正儿：《两个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王青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71-72页。

<sup>26</sup> 见《徐兆玮日记》，合肥：黄山书社，2014，第2册，第823页。日文原文参看国府種德、白河次郎編述：《支那學術史綱》，東京：博文館，1900，第129页。

<sup>27</sup> 有关篇目可参看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 193.

<sup>28</sup> 《再续香港华商会议情形》，《申报》1899年2月2日。

<sup>29</sup> 有关何启在立法会中的表现和作用，可参看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p. 135-164.

<sup>30</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 115.

<sup>31</sup>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页。

<sup>32</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 30. 关于何启去上海的时间与意图也存在争议，G. H. Choa 之书的表述与前文也存有矛盾之处，可参看该书第30、190-191页。关于何启在上海的这次停留，还可参看 Linda Pomeratz-Zhang,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1-102.

<sup>33</sup> Linda Pomeratz-Zhang,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英敛之路经香港，曾数次访问何启寓所。第一次访问不遇，第二次访问则遇到胡礼垣，因双方语言不同（英不会粤语，胡不太会讲国语），双方以笔进行交流。此次见面，英获胡赠《新政要行》一本，及向胡出借《康学书后》一本。直到英敛之第三次来访，才遇到何启、胡礼垣同在，双方终于订交，但沟通语言“只可达意”。其中，英敛之对何启印象尤为深刻，“乃作西装，年四十许，微鬚，状貌魁梧”，“而何公尤轩昂”，英敛之甚至“愿执弟子礼”。当时交往情形在英敛之的日记里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sup>34</sup>以后何启、胡礼垣二人著作在内地印行、销售，多赖英敛之的努力和揄扬。<sup>35</sup>之后，英敛之为创办《大公报》，亦经常写信问询于何启、胡礼垣，并请代为物色翻译等人选。<sup>36</sup>

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美国国务卿曾提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开设大举插手中国内政，干涉义和团事件。随后，何启以 Sinensis 笔名在 1900 年 8 月 22 日《德臣西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Mr. John Bull on the Situation”），讨论义和团问题。他批评海约翰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不理解义和团事件，认为义和团事件起因不在于传教士及其信徒的作为，而是由于高级官员及其部属、士大夫的煽动，他并指陈中国现状的糟糕，点出解决危机之道，希望美国、英国等列强能督促腐败的清政府改革，联络有能力的中国志士，与清廷进行和平谈判。<sup>37</sup>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何启亦曾联合孙中山、港督等，积极游说两广总督李鸿章独立，但并未成功。<sup>38</sup>

光绪二十六年年底（约 1900），增补本《新政真诠》在英敛之的帮助下，由上海著易堂印刷、格致新报馆发行，销量不少，影响颇大，曾出现盗版。<sup>39</sup>

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同文沪报》馆收到香港中国报馆赠送的《新政真诠》一书，特意在该报登载《赠书志谢》式广告，高度揄扬该书：《新政真诠》一书为南海何君沃生、三水胡君翼南所同撰，计《曾论书后》……七种，其书条理蕃护，精义岑奥，决破罗网，荡除榛秽，非有卓识巨力、精思博学，不能翔实若是。真维新之钤键、变法之津梁也。昨承香港中国报馆以一帙见惠，合志数语以鸣谢忱，并为当时留心新学者告焉。<sup>40</sup>而所赠此书的版本很可能就是英敛之代为出版

5.

<sup>34</sup> 参看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第 21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 142-145 页。

<sup>35</sup> 参看方豪：《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兼记〈新政真诠〉二次重印的经过》，第 2110-2118 页。

<sup>36</sup> 参看方豪：《英敛之先生创办〈大公报〉的经过》，《方豪六十自定稿》，第 2035-2054 页。

<sup>37</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p. 227-231.

<sup>38</sup> 参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92-100 页。

<sup>39</sup> 关于《新政真诠》的出版情况及影响，可参看方豪：《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兼记〈新政真诠〉二次重印的经过》，第 2111-2118 页。

<sup>40</sup> 《同文沪报》1901 年 5 月 21 日。

的版本。

光緒二十八年(1902),何啓創辦 St. Stephen's Boy's College。光緒三十三年(1907)起,何啓又參與創辦香港大學。宣統元年(1909),又與胡禮垣共同發起為香港大學募捐活動。胡禮垣稱:“沃生兄所辦公事,當以此為第一。”<sup>41</sup> 在此次募捐活動中,清廷的外務部和兩廣總督都捐款不少,被時論稱之為“豪舉”,“今之袞袞者,視吾全國之學校皆如粵督、皆如外部,皆如其所以贊助香港大學者,吾國教育之進步,寧患不一日千里乎?然而不能吾國之學校多矣,其如非外人建設者何?”<sup>42</sup>

1906年9月1日,孔天增在《寰球中國學生報》英文版發表文章,將何啓同嚴復、林文慶、辜鴻銘、伍廷芳、唐紹儀、梁誠、沈敦和一道,歸為受過外國教育的最傑出中國人之列。<sup>43</sup> 又因為何啓對香港公共事業的參與及貢獻,乃至他與港英當局的良好關係,1912年,英國政府授予他爵士稱號,這是首位華人獲得此爵位,甚至讓何啓母校中央書院(皇仁書院)與有榮焉。<sup>44</sup> 畢竟,對於殖民地香港的不少華人居民來說,這自然是夢寐以求的榮譽。

另外,據1912年4月24日《申報》上《學生會歡迎何啓君》的報道可知,何啓亦曾於1912年4月底再次短期造訪上海,並借住伍廷芳公寓,上海著名學生組織寰球中國學生會還邀請其去參觀訪問。該報道還簡單報道了何啓過去之事跡及主要著述,以及其對於香港的貢獻而獲封爵一事。在對寰球中國學生會的訪問中,何啓發表了“一中時之久”的演說,演說內容主要是團體與個人之關係,據報道說該演講“議論精辟,聞者擊節稱贊”,旁聽者有伍廷芳、李登輝、陳貽范、梅殿華等諸多人士,“頗極一時之盛”。<sup>45</sup>

1912年年底,作為香港華人領袖的何啓,曾勸說華人不要抵抗港英當局為地方治安制訂的電車條例,更不要抵制電車。<sup>46</sup>

何啓不善治生,尤其是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其次兄何神添(又名何添,非後來創辦恒生銀行之何添)破產後,何啓受到牽連,要為之還債。加上何啓子女眾多(十子六女),應酬也多,負擔極重,入不敷出,經常舉債度日,直到他去世,這種生活都沒有改變。

1914年7月21日,何啓突然病逝,留下許多欠債,子女教育亦成問題。儘管有朋友和港英當局的資助,何啓一家人還是於四年後遷往上海,托依於伍廷芳。何啓則葬於只有英人和華人精英

---

<sup>41</sup> 胡禮垣:《復英欽之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77頁。

<sup>42</sup> 《時事小言》,《神州日報》1909年7月25日。

<sup>43</sup> Kung Thies-Cheng, “Prominent Foreign-Educated Chinese,” *The Word's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寰球中國學生報》), Vol. 1, No. 2 (Sept., 1906), pp. 21-22.

<sup>44</sup> 《團體魄》, *The Yellow Dragon* (《黃龍報》), Vol. XIII, No. 7 (April, 1912), p. 309.

<sup>45</sup> 《何啓君參觀學生會》,《申報》1912年4月25日。

<sup>46</sup> 《旅港華商公局會議記事》,《申報》1913年1月14日。

才能安葬的跑马地坟场，今其墓及墓志铭尚存。<sup>47</sup>

## 二、胡礼垣

胡礼垣，字荣懋，号翼南，晚年号逍遥游客。<sup>48</sup>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生于广东三水县三江乡。因父亲经商于香港，遂随父流寓香港。虽然寓居香港，但科举的吸引力依旧很大，少年胡礼垣还是如中国绝大多数士子一样，走的是科举之路，科举不成才去经商和改从别业。只是有关胡礼垣生平的一手资料，同何启一样，也是非常之少。目前最可以依靠的，就是陆廷昌所作《胡翼南先生事略》，该文描述尽管存在不少不够准确或过分美化、夸张、渲染胡礼垣之处，但仍是相关研究者必须依据的文献。

据该文献所言，胡礼垣“少颖异，读书过目成诵，十岁通四书五经能为文。未冠，应童子试，辄冠其曹。”从这段稍显夸大的描述看出，胡礼垣少年所走之路和所读之书，不过，“辄冠其曹”或未必然，否则胡礼垣就不至于“屡试不售，即弃举业”了。这一时期，据胡礼垣写给伍廷芳的信中所述，“先生为垣五十四年前英文之业师”，<sup>49</sup> 他大概在十三四岁时一度追随伍廷芳学过英文。抛弃举业后，胡礼垣不得不另辟道路，选择西学就是必然了，所谓“专研经史，肆力于诗、古文辞，复研究西学”。1862年2月1日，进入所谓“香港大书院”即中央书院读书。<sup>50</sup> 在该校读书期间，胡礼垣“凡西国文学、政治，无不考求”，打下了较为厚实的西学基础。同治九年庚午（1870），或许是因其中西兼通，“以优等毕业，为政府所委任”，<sup>51</sup> 胡礼垣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央书院中文教师，“充院教习”，恰逢何启入校就读时间。二年后，礼垣去职经商。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874年1月5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sup>52</sup> 胡礼垣在光绪五年癸卯（1879）任该报翻译员，到光绪七年（1881）离职赴沪。<sup>53</sup> 这期间，年轻的胡礼垣目

---

<sup>47</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p. 33-34, 271-272.

<sup>48</sup> 陆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见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53页。

<sup>49</sup> 胡礼垣：《致伍秩庸书》，《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56页。

<sup>50</sup> Ed. Y. D., “Note,” *The Yellow Dragon*, Vol. X, No. 8 (May, 1909), p. 149.

<sup>51</sup> 《胡翼南先生墓志铭》，《胡翼南先生全集》，第57页。

<sup>52</sup> 《本报略历》，收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循环日报》社，1932年，第13页。关于《循环日报》的创刊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循环日报》自己所言为准，研究过王韬的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亦采此说。周振鹤教授根据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在1890年所编的《中文报刊》目录，认为《循环日报》创刊于1874年2月4日，特意纠正柯文的看法，但此日期可能不确。参看周振鹤：《范约翰和他的〈中文报刊目录〉》，《出版史料》1992年第3期，第26-34页。

<sup>53</sup> 《本报历届主要职员事略》，收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



睹时弊、历受科举不第的折磨，或许会受到力主改革的王韬一定影响。离开《循环日报》后，胡礼垣一度到郑观应主持之上海电报分局任职。广东老乡陈兰彬、郑藻如分别于1878、1881年奉命出使美国等国，曾邀请胡礼垣为随员，“聘往襄赞”，但胡本人“辞不就”。<sup>54</sup> 后人认为其原因在于胡平素“淡于荣利”。但此说比较牵强，因胡屡曾自述“身居物外，心切囊中”，<sup>55</sup> 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外交官是肥缺，做随员其实并没有多少“荣利”，社会亦轻视之，故一般人视为畏途。1882年（壬午八月），胡礼垣同友人一起去东南亚一带游历与经商，期间，他曾致信友人叙述这一带的物产民情与商机。<sup>56</sup> 胡礼垣亦同冯明珊等人一起，请求英国当地总督给与中国农民一定田地，让其开垦谋生。<sup>57</sup> 由此，遂有不合常情的苏禄国王让国于其之神话诞生。<sup>58</sup> 致个别研究者不查，竟信以为真，为之揄扬不已。<sup>59</sup>

光绪十一年（1885），胡礼垣又到罗鹤朋创办的香港《粤报》任职，因经营不善，《粤报》不久就倒闭，胡礼垣复经商。<sup>60</sup> 礼垣这时还翻译出版了《英例全书》，但没有得到官方重视，礼垣引为至憾，“光绪十一年，鄙人曾将《英例全书》译印，西法精意，多所发明，海内之士，深以为魁。无如在官者虽明知其善，而耻于效人也。”<sup>61</sup>

光绪十三年正月，曾纪泽在1887年2月8日香港英文报《德臣西报》（*China Mail*）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何启以“华士”（Sinensis）笔名在2月16日《德臣西报》上发表了回应文章《曾侯论书后》，批评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的观点。稍后，

---

<sup>54</sup> 陆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胡翼南先生全集》，第54页。

<sup>55</sup> 胡礼垣：《致伍秩庸书》、《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校大隈伯重信书》，《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56、2901页。

<sup>56</sup> 《婆罗洲游记》，《申报》1882年11月8日；《节录胡君翼南自沙略隣埠山打根八月十八日寄予其友信稿》，《申报》1882年11月15日。

<sup>57</sup> 《般乌近闻》，《申报》1882年12月20日。

<sup>58</sup> 陆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胡翼南先生全集》，第54页。

<sup>59</sup> 参看张礼恒：《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附注：张氏该书太多想象附会之言，又缺乏史料辨伪，许多关键介绍虽有所本，但多不注出处；且从近代化角度有选择评析何、胡，不及其余；甚至认为王韬在20世纪还在主编《循环日报》，不知道王韬在1897年即已去世。

<sup>60</sup> 关于《粤报》创办经营情况，可参看麦思源：《六十年来之香港》，收入《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65页。关于香港华人报业情况，还可参看麦思源：《七十年来之香港报业》，《〈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刊》，香港：《华字日报》编辑部，1934年，第1-6页。陆廷昌说胡礼垣创办《粤报》，但结合别的资料，可发现此事不确。不过陆说也有所本，如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即说香港《粤报》的创刊时间为1886年，创办人为Mr. Woo Li-yuen（即胡礼垣，周振鹤教授将之译为吴立元），参看周振鹤：《范约翰和他的〈中文报刊目录〉》，《出版史料》1992年第3期，第33页。故此，我们不能全然相信范约翰的说法。

<sup>61</sup> 《康说书后》，《胡翼南先生全集》，第795页。

该文由胡礼垣译增为中文《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发表。从此确立了两人之合作议政生涯。

大约光绪十九年（约 1893 年年底），胡礼垣东游日本，“癸巳之岁，予游日本。”<sup>62</sup> 礼垣来日意图何为？这时粤人颇多到日本神户等地经商者，《郑孝胥日记》里有多处相关记载。礼垣目的亦可能是为了经商。经商之余的文人赏玩必不可少，他在神户写下《题神户大铜佛诗》。该“诗非佳构”（其实胡诗虽多，但不守“诗法”，多用新名词入诗），还是表现了他的一种对信佛的否定态度及浪漫气质，说明此时之礼垣尚积极入世，决非“淡于荣利”。

光绪二十年三月（1894 年 4 月），胡礼垣卷入一场官司当中，事情源于五年前，他是王宠益借款的三个担保人之一，当时他是一航运公司职员，后来王破产，律师曹善允（1868—1953）便起诉胡，要其代为偿款 16,600 元，久已不为人做辩护律师的何启挺身而出，为胡礼垣打赢了官司；曹其实也是何启的好朋友，在何启晚年照顾何很多，是一战之后香港的风云人物。<sup>63</sup> 同年，胡礼垣、何启合著的《新政论议》发表。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二日（1894 年 8 月 2 日），礼垣于神户拜见驻日领事郑孝胥，据郑日记记载：“胡翼南来，其人年四十余，颇恣直。”<sup>64</sup> 《胡翼南先生事略》中曾言胡礼垣在中日失和时，由于驻日官员均归国，各国领事遂举胡礼垣暂代，“先生固辞不获，遂权摄焉。兵事方棘，调合抚戢商民赖之，其为外人所信服如此。”<sup>65</sup> 张学华的《胡翼南先生墓志铭》亦云：“中日构衅，朝使归国，侨商举君暂时摄领事，绥怀安定，市肆宴然。”<sup>66</sup> 这样的说辞恐系陆廷昌和张学华的想象或夸大之辞，因胡乏实际政治功业，故在其死后进行粉饰溢美。据郑孝胥记载，中日战起，当时官员被命返国，“在倭华民”“允托美国保护”，至于商人“去留听之”，且“不必留西翻译，仍于商家中公举通英文及汉文一人，月给三四十元，作为通事”，选中的这个通事则是与郑孝胥关系密切的广东人“黄槐三”。<sup>67</sup> 文人好名，礼垣也不例外。在胡礼垣自己留下的材料中，对于自己受到的赞扬，几乎都是有闻必录，且到处宣告友朋，但从未述及他曾经在日本暂代领事这个事情；加上常理推测，以胡礼垣当时的身份地位，他似乎不太可能受到各国领事瞩目，故陆、张的这段说辞应该不准确。

大概因为甲午战起，经商不成，礼垣也离开日本返回香港。在香港经商之余，开始担任文学学会译员，“任事三载”。<sup>68</sup> 之后，就过起赋闲生活，“退隐于家”，专事著述，“日惟闭户著书，考察

<sup>62</sup> 《梨园娱老集·弁言》，《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1276 页。

<sup>63</sup> 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pp. 32-33, 46-48.

<sup>64</sup>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430 页。

<sup>65</sup> 陆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55 页。

<sup>66</sup> 《胡翼南先生墓志铭》，《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57 页。

<sup>67</sup> 《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 428 页。

<sup>68</sup> 陆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55 页。

列國政治得失，與何君啓研究法律，至於哲學、宗教，莫不窮其要理。”<sup>69</sup> 胡禮垣與何啓的文字合作進入鼎盛期，以禮垣為主，兩人合作發表多篇主張新政文章，後收入《新政真詮》一書，先後在香港和上海出版。<sup>70</sup> 該書中部分篇目還曾被譯為日文，在日本《東邦協會報》發表，“忽憶十二年前，日本《東邦協會報》曾將鄙人與何君沃生所著《新政真詮》諸編，譯登報中，大肆評論，影響所及中國，學士、大夫乃始折節究心實學。”<sup>71</sup> 《新政真詮》確立了兩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政論家與思想家地位。

光緒二十四年（1898），胡禮垣致信給時在北京觀察中國政情的伊藤博文，“己亥之歲，日本伊藤侯博文在北京時，于嘗致書勸侯當愛人而及人之邦，毋徒顧己而私己之國。”<sup>72</sup>

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十六日，英欽之讀了《新政論議》等文章後，佩服不已，“是晚始句讀何沃生、胡翼南兩先生《新政論議》訖，服其立言明白曉暢，說理滲透切中，直欲向書九叩，不止望空三揖也。其《新政始基》，尤覺為中國之頂門針、對症藥，非抄襲陳言、偏執一見者之，能望其項背。惜余過香港時未能拜謁，一伸欽挹之忱。并恨未能多購若干，分贈朋友，使多欣賞奇文也。”<sup>73</sup> 三月一日，英欽之又讀了《新政始基》諸篇後說：“予極服其剴切詳明，愛莫釋手；但覺其冗句太多，不免詞費，恐人閱未半，而欠伸思睡耳。然較其前作之《新政論議》尚少，前作几近四萬言，何其洋洋洒洒，如長江大河之一瀉千里耶！真近世有數文字。”<sup>74</sup>

光緒二十五年（1899）七月，胡禮垣為即將出版的香港版《新政真詮》撰寫了《前總序》。<sup>75</sup>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胡禮垣、何啓與英欽之訂交。<sup>76</sup> 英欽之到上海後還提胡禮垣贈《明夷待訪錄》等書寄胡。<sup>77</sup> 以後雙方文字、書信往還不斷。光緒二十六年（1900）孟冬，胡禮垣與何啓寫成《新政變通》，胡禮垣又寫成《新政真詮》的《後總序》。稍後英欽之在上海兩次重

<sup>69</sup> 陸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胡翼南先生全集》，第55頁。

<sup>70</sup> 據時人言，《新政真詮》中泰半文章系胡獨著，為“動當道之听”，才“冠以何君之名”，“首兩篇，乃兩君商榷而成，余皆先生（胡禮垣）自著。蓋本大同之主義，而揭立憲之精神者也。”黎乙真：《靈魂不死序》，《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348頁。

<sup>71</sup> 《寄早稻田大學大隈伯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911頁。

<sup>72</sup> 《伊藤嘆詩一百二十五首并序》，《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751頁。此處胡禮垣記憶容或有誤，伊藤1898年9月到北京，月底前往上海等地考察，11月中旬即離開中國，故他致信伊藤事應系1898年。至於胡信的內容，參考民國初建胡禮垣寫給孫中山、伍廷芳的信，恐怕也非胡禮垣此處所言，因為當時伊藤剛從首相任上退下，到中國後受到維新人士熱捧與光緒破格召見，一時輿論有伊藤將為“帝師”暨新政顧問的風傳。胡致信或與此有關。

<sup>73</sup> 方豪編錄：《英欽之先生日記遺稿》，第19頁。

<sup>74</sup> 方豪編錄：《英欽之先生日記遺稿》，第21頁。

<sup>75</sup> 《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19頁。

<sup>76</sup> 方豪編錄：《英欽之先生日記遺稿》，第142-145頁。

<sup>77</sup> 方豪編錄：《英欽之先生日記遺稿》，第146頁。

印《新政真詮》。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丙午，胡禮垣開始寫作《梨園娛老集》，丁未（1907）之春寫成，次年出版。胡禮垣撰寫該書雖早有計劃，但更緣於作者內地遊的刺激，“前年偶遊內地，見竹棚歌舞所演戲文，阻塞進化之機，降低人格之品，中國之不能變，未始不由於此。悵觸於懷，不能自己。”<sup>78</sup> 改良戲曲是清末啟蒙人士中比較普遍的呼聲，胡禮垣身體力行，借用戲曲這個流行文類來宣傳其政治思想與政治理想。“此書雖曰娛老，實小則為少年男女修德育，大則為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作，以梨園者，人所同樂，故借其題，以為發揮。人老則事無能為，只寫其心以為愉快，此《梨園娛老集》之所以名耳。”<sup>79</sup> 全書分兩冊，自許甚高，“第一冊破專制，開大同之基也。第二冊箴自由，立大同之極也。”<sup>80</sup> 書出版後，胡禮垣將其掛號分贈達官顯貴、名流、各報館和廣東紳商，“拙集自告成時，即以掛號法分寄王公大臣、督撫大吏、駐外公使、外國名流、諸家報館，並粵省紳宦以及擁皋比而司覺世牖民之責者。如有介紹，亦必寄呈。無他，為欲開風氣之故也。”<sup>81</sup> 胡禮垣還贈書百部給皇仁書院（即胡所謂香港國家大書院），還給英欽之寫信表達了自己與何啟的區別，“沃生兄勇于立學，鄙人務在立言。異曲同工，和無二致。”<sup>82</sup> 胡禮垣亦托英欽之將此書轉贈嚴復一本，求其品評。<sup>83</sup> 嚴復在回信中禮節性地給予該書很高的評價。<sup>84</sup>

光緒三十四年（1908），粵東特大水災，香港女界、澳門女界為水災捐款捐物，“中國數千年來所未聞”，胡禮垣為此分別寫詩十二首記之。<sup>85</sup>

宣統元年（1909），胡禮垣發表英文公開信，說明贈《梨園娛老集》給皇仁書院及一女校的原因和著述宗旨，並遺憾自己大量用中文書寫導致限制了英語讀者，他亦對“自由”之義進行了學理闡發。<sup>86</sup> 同年，胡禮垣撰寫了《香港創設大學堂勸捐序》。<sup>87</sup> 與何啟共同發起為創辦香港大學的募捐活動。一些香港名流也紛紛撰文稱頌創辦香港大學的意義，所撰部分文章即見於 1909 年的《黃

<sup>78</sup> 《致志堯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921 頁。參看《復英欽之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880 頁。

<sup>79</sup> 《示外孫黃臨初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933 頁。

<sup>80</sup> 《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1248 頁。

<sup>81</sup> 《覆英欽之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927 頁；《示外孫黃臨初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934 頁。

<sup>82</sup> 《復英欽之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879、2882 頁。

<sup>83</sup> 《復英欽之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886 頁；《寄嚴几道書》，《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898-2900 頁。

<sup>84</sup> 《與胡禮垣書》，收入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594 頁。

<sup>85</sup> 《戊申粵東水災香港女界售物賑災詩》等，《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301-2313 頁。

<sup>86</sup> 參看“Correspondence,” *The Yellow Dragon*, Vol. X, No. 8 (May, 1909), pp.147-151.

<sup>87</sup> 收入《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571-2579 頁。

龙报》(The Yellow Dragon)。

宣统二年(1910),胡礼垣感于当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和去年日本朝鲜总督伊藤博文被刺事件,写作《伊藤叹》诗一百二十五首,提倡爱人、和平,反对战争与为私利的帝国主义行径,先后在香港《循环日报》与天津《大公报》发表,年底辑印成书出版。<sup>88</sup>

宣统三年(1911)七月中旬,胡礼垣开始撰写《满洲叹》,共一百五十首,反对开明专制,大力挾伐专制政治和清廷的黑暗统治,先后刊登于天津《大公报》,复辑印成书出版。

辛亥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胡礼垣感于辛亥革命进展如此迅速,遂写作《民国新乐府》,歌颂革命事业,期望获取更大成功,“非徒志喜也,且以惩前毖后之词,为进化文明之劝。”<sup>89</sup>

1911年三四月间,李提摩太发起全球弭兵会的提议,由香港《华字日报》率先报道。胡礼垣看到后遂致李提摩太,并同时寄给李《梨园娱老集》、《伊藤叹》等书,希望李能帮助中国改革弊政,弘扬自由真义,推动全球弭兵计划。<sup>90</sup>胡礼垣该信以《胡君翼南与李提摩太论全球弭兵书》之名还被当时上海《时报》连载。<sup>91</sup>

约1911—1912年之交,胡礼垣写信给伍廷芳,表达对共和肇建的喜悦及愿意为革命出谋划策的热情,提出对清的政策和注意事项,希望伍廷芳能够发挥作用,“为中华植平等自由之福,为寰宇立大同至治之基。”<sup>92</sup>随后,胡礼垣致信孙中山献计献策,表达自己对时局见解,阐发其大同思想,并送《梨园娱老集》、《伊藤叹》、《寄李提摩太书》、《民国新乐府》给孙中山。<sup>93</sup>但孙中山只是礼节性地简单回信,未有进一步表示。胡礼垣遂再次致信伍廷芳,提出对时局的规划,阐发其乌托邦空想,认为中国革命乃“天下和战转折之机关”,中国现在应该抓住机会,“约环球各国,永订和好,从此修文偃武,只凭公理而行,惟以道德相尚……”<sup>94</sup>胡礼垣这里亦寄书给伍廷芳,请伍代为送书给温宗尧等人,以扩大自己声名。

1914年7月2日,何启出殡当日,胡礼垣作《灵魂不死》文,回忆往事,怀念何启及另一亡

<sup>88</sup> 《伊藤叹诗一百二十五首并序》,《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751页;邵浦源:《伊藤叹诗序》,《胡翼南先生全集》,第1750页。

<sup>89</sup> 《民国新乐府·并序》,《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271页;参看《与孙中山书》,《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51页。

<sup>90</sup> 《寄李提摩太书》,《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64-2875页。

<sup>91</sup> 《时报》1911年6月9日、1911年6月10日、1911年6月11日、1911年6月14日,等等。因笔者所见《时报》有残缺,胡信剩余部分未见。

<sup>92</sup> 《致伍秩庸书》,《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56页。

<sup>93</sup> 《与孙中山书》,《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47-2851页。

<sup>94</sup> 《再答伍秩庸书》,《胡翼南先生全集》,第2859页。



友区氏，并感慨欧战酷烈，阐发进化论、基督教和佛教杂糅的灵魂不死观念及信仰。<sup>95</sup>

1914 年年底（甲寅冬月），胡礼垣开始写作《德王叹》，诗成共三百首，主旨为呼吁和平，主张国家之间应该争胜于道德而非血气，谴责德国破坏中立，穷兵黩武，发动战争。同时开始写作《宗教略义》，批判、反思欧战，阐发宗教作用。此文或可被视为欧战后中国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先声。

1916 年 10 月 14 日（丙辰年九月十八日），胡礼垣病逝于香港，葬于香港铜锣湾加路连山，妻梁氏先逝，遗有子三、女一。著书二十三种，文集汇为《胡翼南先生全集》，凡六十卷，在 1920 年出版。

### 三、小结

以上大致钩沉了何启两人的行迹及相关的著述情况，应该能对既有的研究做些纠正补充，并能提示若干资料线索和研究信息。但侑于笔者所见资料，像同何启有关的香港立法会的档案，不但发表何启文章、还可能会报道何启行迹的英文《德臣西报》（*China Mail*），何启在英国求学学校的档案，同何启、胡礼垣有关的香港大学档案，胡礼垣可能发表过文章的《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等资料，除了个别如保存不完整的《循环日报》外，其余资料笔者几乎皆未曾寓目。故此，本文在叙述两人生平行迹中的关键部分时仍旧比较简单，很多只能靠旁人的记载或报刊报道中偶尔的涉及来拼凑，希望以后能有时间继续为两人生平行迹增补资料。

---

<sup>95</sup> 黎乙真：《灵魂不死序》，《胡翼南先生全集》，第 2347 页。